


21世纪高等院校创新课程规划教材

简明英汉

简明
英汉
互译教程

李昌银 崔晓霞 /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简明英汉互译教程

李昌银 崔晓霞 主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英汉互译教程 / 李昌银, 崔晓霞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58 - 7356 - 8

I. 简… II. ①李…②崔… III. 英语—翻译—教材
IV. 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036 号

责任编辑：张 力 周胜婷

责任校对：杨晓莹

技术编辑：董永亭

简明英汉互译教程

李昌银 崔晓霞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电话：88191109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16 开 15 印张 30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7356 - 8/F · 6607 定价：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昌银 崔晓霞

副主编 资谷生 张 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朝迎 张 全 李昌银 李 睿 杨 玉

杨亚佳 赵俊姝 资谷生 黄琼英 崔晓霞

谢海燕 魏建乔

编者的话

现在的各种翻译教材已经不少，还有再编一本的理由吗？我们的回答是：有，而且很充分。这些教材虽然都很好，但使用起来总感觉有些美中不足，要么例句陈旧，要么仅适用于某一专业，要么重理论轻实践，要么重实践轻理论，要么偏重文学，要么偏重科技经贸。而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把翻译课作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一种手段，而只注重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因此，本教程努力解决两个问题：

一、人文性。首先，本书用第一章专门介绍中西翻译史，除了阐述自中国先秦和欧洲古希腊以来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外，更强调了翻译在文化交往和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中国而言，当今儒道佛三教并行的文化格局归功于汉朝以来的佛经翻译，而改革开放则与清末民初的西学汉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没有翻译就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没有今天的西方。其次，本书特地开辟一章，对历代翻译佳作进行简要分析，目的是提高学生对译作的审美兴趣和欣赏水平，达到怡情养性的效果。

二、适用性。(1) 本书由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出发，找出语际转换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并将这些原则用于指导翻译活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2) 在讲解翻译技巧的各章中，不流连于空泛的理论，而是在简单介绍一个规则之后用充分的例句进行支撑，起到立竿见影之效。(3) 除了一般文体的翻译外，开辟专章讲授科技文体和经贸文体的翻译，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要。(4) 在第二章的“英汉语言对比”和最后的“附录4”中对历年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进行解析，以期对关心这一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有所帮助。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都是在各高校外语专业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有资深教授、博士，也有年轻有为的副教授和讲师。具体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黄琼英；第二章：张全；第三章：李睿；第四章：任朝迎；第五章：杨亚佳；第六章：谢海燕；第七章：资谷生；第八章：赵俊姝；第九章：杨玉；第十章第一节：任朝迎，第二节：崔晓霞；第十一章：李昌银；后记、附录2、附录3、附录4：魏建乔。全书由李昌银负责校改统稿。

本书付梓之际，编委会竭诚感谢下列单位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云南师范大学何昌邑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大为增色。相关各校外语院系的领导。他们或亲自参与本书的编撰，或鼓励支持本单位的年轻老师参加编写工作，使这一集体合作项目得以完成，功不可没。

最后，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现行的几十种翻译教材和翻译专著（详细情况见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但由于篇幅所限，所引译例并未逐一以夹注形式注明出处。对此，希望同行专家们谅解，编者深表谢忱。

编者

2008年4月于昆明莲花池畔

序

在历史的视野中，中国曾以“中央大国”雄视万邦。盖因神州大地，东临沧海，西横昆仑，北卧广原，南视热谷，其天然之屏障虽可捍国，但也阻域外之声。而励精图治者，为华夏的崛起，锐意改革，借用番胡思想精粹与技术精华，离翻译何为？华夏数千年文明史跌宕起伏，与异域文明和技术的引进相互映射，其间译者的功用昭然若揭。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 21 世纪，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其表征之一就是学科建设上，“翻译学”已与“文学”、“语言学”并驾齐驱。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之一，教材建设往往走在前列。近 30 年来，翻译教材层出不穷，各以其自诩的标准或大纲为中心，或者以“大家”和“国家”冠以光环；殊不知泱泱大国并未平衡发展，传统的“一点四方”模式不宜统领全国，因为地区差异不是由“中心”来消解的，理论的裂痕也不是在“大家”的书斋中可以窥破和弥补的。加之，真正的研究成果依赖田野调查和实践检验，真正适用的教材来自于富于思考的教学体验和对教学对象的正确了解。如现代语言学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伦敦大学的第一任语言学教授 J. R. 弗思 (J. R. Firth) 的语言观主要建立在对印度的民族语言的具体调查和深入分析上，而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大师 L. 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对语言的洞察也基于对印地安支系克里语的田野调查；他们没有追随当时的主导模式或大纲，因而成为一代宗师。

就翻译而论，是否存在一统四海的标准呢？在负笈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期间，笔者曾求师拜友以图其解，但遗憾依旧。自己多年的翻译教学表明，与研究生可以切磋翻译理论，但引导其运用常令人汗颜；自己几十部文本的翻译实践证明，似乎单一的文本翻译比较容易把握感觉或统一标准；而不同文本的翻译难道有相同的路径吗？笔者翻译过六千余份不同的论文摘要，内容涉及数十种学科，作者包括学界翘楚如叶秀山、汤一介、杜维明、戴庆厦、黄益民、周国平、周大鸣、张汝伦、陈嘉映等；我辈后学无法窥破其学问之万一，但是还得

带着“镣铐跳舞”（翻译）。笔者在诚惶诚恐的翻译中依赖的还是对语言的基本把握和多年的翻译实践，译文似乎没有曲解大师们的源语文本之底蕴。窃以为当今翻译理论和语言理论虽然日新月异，但是翻译教学应该先回归语言教学，然后才是文化底蕴的剖析和传输。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李昌银教授和崔晓霞教授主编的《简明英汉互译教程》值得推荐。

《简明英汉互译教程》在前两章中简述了中西翻译史以及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然后用其主要篇幅讨论了词汇和句子的翻译，涉及词义、词类和句子成分转换，词语的增补和省略，词序调控和结构的调整，定语从句和被动语态的翻译；省略句和特殊字句的译法，习语的翻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第十章讨论了常用的科技文体和经贸合同文体的翻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第十一章为译林佳品赏析，提供了数位名家的翻译和评介，既映射出译界前辈的探索与学养，也对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有益。

简言之，《简明英汉互译教程》的编写框架与传统的翻译教程虽然有所重合，但是作者是以心相待，基于本土教学的亲身感受，不亦步亦趋地追随流行的理论先在，放逐了强势话语规定的“异化”、“归化”等“公式”；在兼顾人文性的同时，强调其适用性；所采用的翻译原则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其例句简洁恰当；虽由于篇幅所限而无法面面俱到，但尽量兼顾了多种文体的翻译，解读有的放矢，言简意赅，是基于翻译实践的切身体验，绝非趋时之作；所以细读既能提供恰当的翻译训练也能拓宽视野，回归了翻译教学的基本目的。

是为序。

何昌邑

2008年6月10日

于昆明陋室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翻译史概述	1
1.1 中国翻译史概述	1
1.2 西方翻译史概述	6
第二章 中西思维模式差异与英汉语言对比	11
2.1 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	11
2.2 英汉语言对比	15
第三章 英译汉的常用方法 (一): 词语转换	29
3.1 词义转换	29
3.2 词类转换	32
3.3 句子成分转换	37
第四章 英译汉的常用方法 (二): 词语的增补、省略与重复	42
4.1 词语的增补	42
4.2 词语的省略	46
4.3 词语的重复	51
第五章 英译汉的常用方法 (三): 词序与句子结构的调整	56
5.1 词序调整	56
5.2 句子结构的调整	62
第六章 英译汉的常用方法 (四): 英语中几种句子结构的翻译	70
6.1 定语从句的译法	70
6.2 被动语态的译法	73
6.3 it is 和 there be 句型的译法	77
6.4 英语长句的翻译	83

第七章 汉译英概述	88
7.1 汉译英的现状	88
7.2 汉译英的基本程序和注意事项	91
第八章 汉译英常用方法与技巧 (一): 几种汉语句型的译法	102
8.1 无主句的译法	102
8.2 省略句的译法	105
8.3 “把”字句的译法	108
8.4 “得”字句的译法	111
8.5 连动式的译法	114
8.6 兼语式的译法	117
第九章 汉译英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二): 其他情况的处理	122
9.1 重复词语和重复结构的处理	122
9.2 外位结构的处理	126
9.3 习语的译法	128
9.4 正说与反说	132
9.5 长句的处理	135
第十章 常用应用文体翻译	140
10.1 科技文体翻译	140
10.2 经贸合同文体翻译	149
第十一章 译林佳品赏析	159
11.1 严译《天演论》片断	159
11.2 王译《谈读书》	161
11.3 英诗汉译撷英	163
11.4 书名与商标	179
附录1 练习参考答案	183
附录2 国内外外语专业期刊和主要翻译杂志目录	205
附录3 国内外主要外语及翻译网站一览表	206
附录4 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翻译真题解析	207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27

第一章

中西翻译史概述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在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与外族交往的文字记载，到了周代，则有了关于翻译活动明确的史实记载，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里，已经有了翻译官的专门职称“象胥”（陈福康，1992）。在西方，早在公元前3000年亚述帝国就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在公元前18世纪穆拉比国王统治的巴比伦王国时期，国王的许多法律、政令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下达庶民，许多政事也必须依靠议员的协作才能办理。公元前3世纪，《七十二子希腊文本圣经》和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已相继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罗马问世（廖七一，2000）。由此算来，人类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保存、文化的建构、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

1.1 中国翻译史概述

中国的翻译事业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出现过的翻译高潮大致有五次。

第一次翻译高潮起自汉魏，盛于隋唐，延续至宋元，历时一千四百多年，此间中外僧侣把大量佛经翻译成中文。我国的翻译始于公元148年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安息国人安世高将梵文《安般守愈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译成汉文，他偏重直译，读者不易看懂。稍后，西域月支国人婁迦讖来中国，此人又被称为支娄迦讖，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其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本的面目，多用音译。支娄迦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支谦在《法华经序》里认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指出了翻译之难。他批评竺将炎的翻译“近于质直”，“其辞不雅”。维祇难等人则主张译经“当令易晓”、“勿失阙义”、“实易经达”，并引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为证。最后他只得妥协，在自己的翻译中贯彻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原则。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到了苻秦时代，佛经翻译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视，进而逐渐开始了有组织、有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活动。东晋释道安从前人的佛经翻译中、诸多佛经译本的问世

和宣讲中，开始比较和研究不同的译本，对照重要的佛典参证，领悟了译经质量对于传法的重要性。道安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楞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里还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道安被称为中国明确研究翻译理论并将理论行之于实践的第一人。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一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鸠摩罗什还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和语趣问题，对文学翻译影响甚大。南北朝时，应梁武帝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翻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从隋代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著名高僧译经家彦琮，梵文造诣很深。他对于翻译理论，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经不容易，理籍名贤”，在其《辨正论》一文中提出“八备”之说，即做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彦琮把重译本研究的视角转移到翻译的主体——译者身上，用这一观点丰富了前人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时至唐代，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他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一起号称我国佛教四大翻译家。玄奘在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十一种（马祖毅，1998）。玄奘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玄奘明于佛法，兼通梵汉语言，译笔严谨，多用直译，善参意译，世称“新译”。玄奘对照以前的旧译文，凡错误艰涩，不易晓悟，或有失意者，一一重译。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制定了“五不翻”原则，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玄奘时期我国的佛经翻译达到了顶峰，开创了我国翻译理论的新局面。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很多佛经。后来武宗灭佛，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虽然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他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理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翻译事业渐渐走向衰落。

由佛经翻译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较为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王克非，1997）。这一漫长的佛经翻译史中不仅产生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翻译大家，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标准，设立了官方的译事机构。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创立了口、笔译相结合，中外译者相结合的集体翻译方式。这一时期译论的发展，奠定了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地位。但该阶段的译论无一例外地只涉及译经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灵感始于译经，也止于译经。由于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音韵、句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使“佛经”和“论”两种文体进入汉文。

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逐步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的时期。此间西方殖民主义大国的耶稣会教士打着“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两面大旗，携带科学书籍闯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华大地，译述西方科学书籍和宗教书籍，从而在我国明末清初引发了一个科技翻译高潮。参与翻译的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本土学者外，还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比较著名的译作分别为：1606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1612年，意大利人熊三拔和徐光启合译了《泰西水法》；1623~1630年，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等（黎难秋，1996）。明末清初时期在译学理论、方法研究及创建翻译、出版机构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利玛窦是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译者。1687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在巴黎首次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康熙年间，法国人白晋（Joachim Bouvet）、刘应（Visdelou）、马若瑟（Joseph-Maria de Premare）和雷孝思（Regis）先后对《易》和《尚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就这样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的翻译与介绍，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译本，流传到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传教士汤若望，德国科隆人，精通天文历算，抵华后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技翻译机构——明末历局，在历局参加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乃至大炮等物。总之，明清的翻译活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和西方传教士有关。西方传教士来华，其最高宗旨是为传播天主教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下和与早期殖民主义相结合背景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国的科学与翻译事业的中介力量，他们也起到了传媒作用，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时期出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高潮。最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梁启超、林纾等。《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1894年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栴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马建忠的“善译”就是要求译者对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最后还要摹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毫无二致，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时相同的感受。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语法学、修辞学，以致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翻译标准客观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钱钟书在《译事三难》中首先指出了“信、达、雅”早已见于《法句经序》

的事实)；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之先河。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除了“信、达、雅”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所在”。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梁启超的“译书三义”，即“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和“养能译之才”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面对危亡，梁氏深察“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唯有“政事”而非兵械、制造等“术艺”才能“救焚拯溺”，他视译书为“经国之大业”和“强国第一义”。

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84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林纾本人不懂外文，翻译时在合作者的帮助下理解原文，然后用文言表达出来。虽然林纾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他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无形中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综观这一时期，我国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和突破，尤其当推严复“信、达、雅”之说。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仍然体现了很强的功利性，局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因而这一时期仍未出现翻译理论专著。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是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和白话翻译的新纪元，语言从文言正宗转为白话本位。“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读者群的变化，相应地要求译本语体的改变以适应新一代读者，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开始了用白话进行翻译。鲁迅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鲁迅关于翻译方面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和突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第四，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第五，关于翻译批评问题。鲁迅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文学革命运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的先导，《共产党宣言》等一

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革命做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后,中国翻译理论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了著名的“神似”说。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显而易见,傅雷是主张意译的,他认为,文学翻译应该抛开原文形式的束缚,追求在精神或意境上与原文一致。即不求貌同,正由神合。“神似”说把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1964年,傅雷的挚友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即“化境”说。他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还说过:“好的译本应当仿佛是原文作者的译入语写作。”傅雷和钱钟书的理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代表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因此说,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第五次翻译高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这个时期我国对马列著作、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等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锻炼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和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入了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导向的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该时期对我国翻译理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苏联的翻译理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翻译、学术著作引入国门,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其中以奈达的著作为最多,也最系统,其影响也最大。90年代后半期一些人提出了翻译标准的多元化。由于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等渗透到翻译研究之中,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所以应从新的高度、多维角度来看待翻译的标准问题。这一切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形成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一段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的热潮。这一次翻译热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这

一次翻译热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几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它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推进，方兴未艾，蔚为壮观。黄龙的《翻译学》是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该书很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1988），这些见解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在翻译方法和文学翻译的风格上，许渊冲的《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中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在翻译理论与文体的关系方面，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中认为：“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适应性。”此外，“翻译理论基本模式”是刘宓庆提出的一个理论范畴，他提出的是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是王佐良。他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等文，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此外，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翻译艺术，有的研究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翻译的特点与技法。随着我国学者在理论探讨上不断深化和细化，加上西方译论对自身理论并非绝对完美的认识与检讨，人们发现西方的翻译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发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呼声。一些学者、教授也分别著书立说论述自己的看法，如辜正坤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杨自俭的《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张柏然和张思洁的《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许渊冲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王东风的《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等。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译学应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寻求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唯其如此，才是世界性的翻译学。

1.2 西方翻译史概述

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 4 世纪。当时希腊社会开始走向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灿烂的希腊文化依然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西方幸存的最早译作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前 285 ~ 249 年）。当时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邀请了 72 名学者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以满足亚历山大城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需要，书名叫《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公元前 3 世纪中叶，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尼库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其后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用拉丁语翻译或改

编了荷马史诗以及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及米南德等人的大批希腊作品，把古希腊的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发表对翻译的零星见解。比较重要的有西塞罗与贺拉斯的保留原作风格，反对字当句对的理论。西塞罗首次把翻译区分“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这样，西塞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这成了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谭载喜，1991）。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向前发展。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提出的译作应“与原作竞争”之说。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并不系统，只是文学家、神学家在谈论其他主题之外，或翻译家在译作的序、跋中，附带加以阐述的观点。

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4~6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宗教势力很强大，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4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与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这一时期，哲罗姆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坚持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而不靠“上帝的感召”。哲罗姆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西方各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中，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得到了继承。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奥古斯丁认为《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优秀的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熟悉待译材料的内容；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波伊提乌认为风格与内容二者不可兼得，译者所寻求的应是内容的准确，而不是优雅的风格。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宗教翻译使《圣经》以及其他神学著作的翻译，逐渐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西方翻译的主流。

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11~13世纪（中世纪后期）。这是希腊典籍“回娘家”的时期。早在9世纪和10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到了11世纪，这些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作品大量出现在西班牙的托莱多。11~12世纪间，西方翻译家云集托莱多。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成立了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大批希腊作品又从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至于翻译理论问题，托莱多“翻译院”则无甚贡献可言。在那里从事翻译的人大都是只管实干不谈理论。从译成品来看，他们主要采用意译（谭载喜，1991）。